

# 基于个体生命历程视角的苏南城镇化路径转变与市民化进程

冯 健, 叶 竹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北京 100871)

**摘 要:** 本文通过对个体生命历程的考察, 从微观视角探讨苏南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城镇化路径转变以及转型中的农民市民化进程。地方政府在中国行政和经济分权、土地、住房等一系列改革中不断追求地方利益最大化, 从而促使苏南从早期的以乡村工业化动力、以小城镇为载体的“自下而上”式城镇化, 转向由开发区建设和土地财政所推动的快速城镇化。城镇化路径转变也影响了苏南农民的生命历程, 文中个案就经历了从乡镇企业家、私营企业主到失地农民的身份变迁。在苏南农民的市民化进程中, 个体经历了不同“行动地位”的转变: 乡镇企业时期, 农民参与乡村工业, 主动进行就业的非农化; 但到了征地拆迁时期, 农民在政府推动下, 通过户籍改革和安置上楼进行了身份的城镇化, 这个阶段的市民化, 更多源于政府的主动推动, 农民带有“被动接受”的成分。另外, 早期的就业非农化成为后期村民顺利实现身份城镇化的基础, 解决了村民失去土地、安置“上楼”后的经济来源问题, 这对当前新型城镇化所倡导的“人的城镇化”具有一定启示。

**关键词:** 城镇化; 市民化; 生命历程; 生活史; 苏南

## 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城镇化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城镇化水平从 1979 年的 17.9% 增长到 2015 年的 56.1%, 按照统计数据, 数以亿计的农民已经实现市民化。近年来, 政府在新型城镇化中所强调的“人的城镇化”观点, 促使我们有必要关注城镇化中的“个体”。

西方国家对于第三世界国家城镇化模式曾有一种假设: 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城镇化也会与西方国家具有相似的过程 (Sheppard et al, 2015)。但实际上, 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走出了自己的城镇化道路, 如中国的城镇化模式就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建国初期, 中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城镇化发展缓慢, 但在改革开放后, 中国走出了以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三角模式为代表的城镇化经典模式。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 市场已经完全融入城镇化过程。市场化的中国城镇化出现

了转型, 变得更加复杂, 需要从更加综合的视角进行审视 (冯健, 2012)。值得强调的是, 城镇化研究需要个体的视角, 因为农民个体在城镇化中不断市民化的过程累积起来就构成了宏观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国城镇化从改革开放以来, 发生了很多转变, 这些转变对城镇化中个体市民化的方式和进程产生影响。但目前学术界针对中国市民化的研究, 一方面聚焦在农民市民化障碍和困境, 以及长期的城乡二元分割所造成的农民与市民在价值观念、生活状态、行为角色等方面的巨大差异 (王春光, 2006; 黄崑, 2011; 刘晔等, 2012); 另一方面着重探讨如何从户籍、就业、公共服务、认知上促进市民化 (姜作培, 2003; Chan, 2009; Afridi et al, 2015; Tse, 2016; 吴业苗, 2016); 少有文献从城镇化转变的角度讨论农民个体的市民化进程。由于城镇化是一个农民不断成为市民的过程, 将城镇化历程和农民个体的市民化进程联系在一起进行讨论, 对于理解新型城镇化中“人的城镇化”有重要意义。

收稿日期: 2016-11; 修订日期: 2017-01。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1671157) [Foundation: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 41671157]。

作者简介: 冯健 (1975-), 男, 江苏沛县人, 博士, 副教授, 主要从事城市地理研究, E-mail: fengjian@pku.edu.cn。

引用格式: 冯健, 叶竹. 2017. 基于个体生命历程视角的苏南城镇化路径转变与市民化进程[J]. 地理科学进展, 36(2): 137-150. [Feng J, Ye Z. 2017. Urban transformation and the progress of citizenization in Southern Jiangsu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life course[J]. Progress in Geography, 36(2): 137-150.]. DOI: 10.18306/dlkxjz.2017.02.001

苏南是中国改革开放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以乡镇企业发展为代表的苏南模式也是中国著名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之一。20世纪80年代,苏南地方政府和农民以乡镇企业为发力点,走出了一条别样的城镇化道路,实现了“自下而上”式城镇化。后来,传统的苏南模式逐渐终结,苏南进行了转型,成为“以资本带动、制造业发展、开发区建设为主要推动力,以快速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为主要特征”的城镇化(顾朝林等, 2008)。苏南不同阶段的城镇化模式转变,影响到苏南农民的“市民化”进程。在苏南相对较长又历经变迁的城镇化发展历程中,农民个体是如何实现市民化的? 其市民化过程是否顺利? 是否真正实现了市民化? 在不同的城镇化阶段,农民的市民化又存在哪些特征? 都是进一步诠释苏南发展及苏南模式所值得思考的问题。传统上对“自下而上”式苏南城镇化的研究,“向下”的源头一般到镇政府、村集体等基层组织,缺乏对农民个体的关注,突出个体的视角才是彻底的“自下而上”视角,这种视角对认识苏南模式的现代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利用个体生命历程方法,联系苏南城镇化路径转变的背后机制,从个体角度关注和诠释农民的市民化进程,以求对同类文献有所补充。

## 2 城镇化转变的理论视角与本文理论框架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一系列经济、政治制度改革以及全球化力量推动了城镇化转型,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以农村工业化为主要动力、以小城镇为主要空间载体的城镇化,90年代后期则是以土地资本带动、以大城市为基础的快速城镇化(Lin, 2007)。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从市场化、分权化、全球化以及地方政府管治转型对中国城镇化路径转变进行理论层面的概括,其中管治转型又是前三个因素综合影响下的结果。

### 2.1 城镇化转变的理论视角

#### 2.1.1 土地的市场化与资本化

计划经济时期,土地被看作是一种固定的生产资源,不存在地租地价,1987年中国进行了城市土地制度改革,允许土地进行市场化交易,使得土地成为可以在市场中流通的资本要素(Lin et al, 2011)。这场改革形成了中国“二元化”的土地市场结构,成为中国城镇化转型的基础(洪世键等,

2009)。首先,改革允许城市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在市场上进行交易,而农村集体土地则不能进行交易;另外,改革在推进城市土地市场化的同时,也保留了原有的行政划拨形式。由此就形成了“二元”城乡土地市场和“双轨制”的城市土地市场。

土地的市场化和资本化从三个方面推动了城镇化:首先,政府可以通过土地出让获得利润并用来完善城市建设,吸引投资(Wu, 1999)。在中国的二元土地市场中,农村土地只能经过地方政府征收后转为国有用地,再进行招拍挂并通过市场出售。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巨大的套利空间,政府垄断土地使用权的一级市场,压低土地征收成本,而由市场决定的土地出让价格远远高于农村征地赔偿,从中产生的利润剪刀差成为地方政府开发城市土地的动机(Chan, 1992; 周飞舟, 2007)。其次,地方政府可根据土地用途差异化出租国有土地。通常地方政府压低工业用地的价格以吸引外来投资,投资带来了地区发展,土地获得升值后,其他土地再高价租给房地产和商业,以此来补偿早期工业发展中的损失,并且政府还可以从中获取持续的税收(Lin, 2007; Lin et al, 2011)。因此,中国现阶段以土地财政推动的城镇化,一定程度上是地方政府利用土地制度中的缺陷“以地生财”的结果(Ding, 2003; 陈鹏, 2007)。最后,土地还为地方政府获得金融资金创造了条件。政府通过成立国有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利用这些金融平台通过土地抵押从银行获得贷款来进行城市建设(Xu et al, 2005; McGee et al, 2007; 周飞舟等, 2015)。

#### 2.1.2 中央与地方政府分权化

很多学者认为政治经济因素对于中国城市转型的影响最为关键(Lin et al, 2002; Ma, 2002),城市转型在根本意义上就是一个政治经济的过程(Wu, 2003b)。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财政和行政上的分权是城镇化转型的重要原因。分权赋予了地方政府相对独立的利益,并且强化了地方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张京祥等, 2008)。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财政包干制度中,按照企业的隶属关系来收取税收,乡镇企业属于地方政府管辖,地方政府获得了大量的乡镇企业税收(Oi, 1992)。同时,乡镇企业还倾向于向地方政府缴纳“企业上缴利润”,作为地方的预算外收入(周飞舟, 2006)。这两点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地方政府发展乡镇企业的积极性。乡镇企业的发展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而实现了“自下而上”的城镇

化(Ma et al, 1994, 2002)。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央政府通过权力下放以及分税制改革逐渐将增长压力转移给了地方政府(张京祥等, 2013)。分权主要从3个方面影响了地方政府的城市建设:首先分税制实施后,地方政府曾经依赖的经济税种大部分归国家所有,地方政府无法依赖乡镇企业,转向通过土地经营来进行竞争(周飞舟, 2006),促使从自下而上的城镇化模式转向土地财政。第二,土地出让权力的下放使得地方政府可以将土地作为资本进行出让,获取利润。土地改革后,地方土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分离,土地使用权可以通过招拍挂成为地方政府获取利润的方式。第三,分权后地方政府拥有的行政权力扩大,行政力量成为前面两种权力顺利行使的保障(王文超等, 2010),例如地方政府享有的城市规划权力使其能不断扩张工业用地、改造城市空间,从而促进城市发展以及获取收入。

### 2.1.3 全球城市体系及全球化

全球化也是推动中国城市转型的重要力量。生产的全球化使得全球城市体系的产生成为了一种新的经济空间现象(Ma, 2002)。全球城市体系由最顶端的全球城市,以及次一级的地区性服务中心和其他负责生产和装配的城市构成。其中,全球城市不仅是全球性协调的节点,更重要的是全球性生产控制中心(Sassen, 1991)。全球资本通过跨国公司流向世界,跨国公司及其全球活动使得世界生产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跨国公司选择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最优的资源配置,青睐大都市区,因而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中国将资本投资的重点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转移到城市地区,尤其是大城市(Ma, 2005; Lin, 2009)。

一方面,全球化促进了中国城市的工业化。全球化最先促进了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的发展,通过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产业转移和技术输入,中国沿海地区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唐的城市密集区域,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成为超大城市(Lin, 1997; Shen, 2002; 顾朝林等, 2005)。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特别是大城市的地方政府,为了在全球城市体系中占据更高的位置,努力经营城市,这个过程也促进土地财政的发展。空间生产和空间提升成为提高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手段(Yusuf et al, 2002; Zhu, 2002; Han et al, 2003)。弗里德曼(2004)强调全球城市的发展应该基于自身的能力和资源,内生因素可推动全球城市产生。在中

国,制度是最大的优势,因此,“中国模式”下的“全球化城市”营造,是一个“在制度激励下,地方政府为城市转型升级而持续进行空间生产(制度空间和物质空间)的历史过程”(李志刚等, 2011)。吴缚龙等将上海的崛起视为一项政府工程,政府通过改善城市形象、开发区建设、为投资者提供优惠措施、提升基础设施等策略来提升城市,上海的全球化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全力塑造的结果(Wu, 2003a)。相似地,广州市政府也从制度和空间两个层面,采用行政区域重组、空间重构、设施提升和事件推动的手段,推动了广州的全球化(李志刚等, 2011)。总之,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来资本,不断在政策、资本、城市建成环境、设施等方面加以改善,以此提高城市竞争力(Lin, 2007)。

但跨国资本转移都是为了谋取新的利益,资本转移的结果总是全球资本获胜,而地方城市让步,全球企业的高额利润多是从地方城市的优惠中获得,是地方政府财政转移的结果(张庭伟, 2003)。中国地方政府以土地财政推动开发区廉价售出的工业用地和新城建设成为地方在全球化中的“补贴”。

### 2.1.4 地方政府管治的企业化转型

从地方政府管治转型来探讨城市和城镇化发展转变是一个热门话题,形成了城市增长联盟、企业家型城市、政体理论等一系列理论。近20年来,在全球竞争的压力下,地方政府普遍从原来福利国家的管理功能中走出来,在管理领域和服务方面出现了职能扩张,以此来培育和鼓励地方经济增长(卢现祥, 2000)。当地方政府为了在其任期内获得快速的经济增长,像企业家一样冒险、创新和被利益驱动时,就是在建立“企业家型城市”(Harvey, 1989; Wu, 2003b)。企业家型城市为获得更多利润而不断创新、改革,具有生产新城市空间、新空间生产方式、新城市生存市场、新资金来源以及城市位置再定义等特征(Jessop et al, 2000)。为了实现地方经济增长,地方政府通常与企业合作结成联盟,地方政府为企业提供自己的行政和公共资源优势,拥有资本的企业与拥有行政资源的地方政府就成为了“城市增长机器”(Molotch, 1993),各自在发展中谋利。

这些理论都强调了地方政府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虽然理论源于西方,一定程度上也吻合中国现阶段的发展。早在改革开放初期,苏南地方政府与乡镇企业就形成了“地方法团主义”,政府不仅为乡镇企业提供行政服务,同时也共同参与企业决



策,共担企业风险(Oi, 1992),在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苏南乡镇企业获得快速发展。此后在中国的一系列制度改革以及全球化竞争压力下,地方政府从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央政府延伸部门”的被动角色,转变成为一个主动追求利益的角色(Wu, 2000),越来越符合西方国家的政府企业化理论。在中国“增长主义”和地方政府官员的“竞争锦标赛”的背景下,追求GDP增长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一要义(周黎安, 2004; 张京祥等, 2013)。土地财政、地方债务、巨型工程和招商引资成为地方政府企业化的主要行为(张三保等, 2014)。在地方政府企业化的主导下,中国城市越来越倾向于以行政区划调整为载体、以短期效益最大化为目标,强调非经济理性的政绩增长和以增长联盟为主体的博弈关系(张京祥等, 2006)。

## 2.2 本文分析的理论框架

从上述研究中可以看出,中国的一系列制度改革和全球化是影响城镇化路径转变的重要因素。地方政府的管治转型在城镇化转变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地方政府在上述变迁的社会环境中不断选择对地方最有利的行为,最终导致了城镇化路径的转变。在城镇化研究中,政府、土地、空间、企业等都常被作为讨论的主体,并且大多数研究都从宏观或者中观层面开展,但缺乏对城镇化中微观个体的讨论。

本文侧重从个体生命历程的视角建立诠释苏南城镇化路径转变的分析框架(图1),个体的生命历程和前文所讨论的理论视角可以挂钩。宏观的城镇化变迁通过社会限制和社会机会对农民的生命角色、机遇和能动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其生命历程,也逐渐推进了农民的市民化进程。苏南地方政府在中央和地方分权、土地市场化和全球化中,从经营乡镇企业转变到推进开发区建设、实现土地财政

的行为选择,导致了苏南城镇化路径的转变。

## 3 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

### 3.1 研究方法

生命历程法最早源于生活史研究,1918-1920年,美国芝加哥学派的托马斯等(Thomas & Znaniecki)在著作《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部移民史经典》中,通过“生活研究法”对波兰农民的失业、贫困和迁移等进行了记叙,书写了普通人的历史。所谓生命历程,是指个体在一生中会不断扮演的社会规定角色和事件,这些角色或时间的顺序是按年龄层级排列的(Elder Jr, 1974)。生命历程包含了四个基本的原理,即“一定时空中的生活”原理、“个人能动性”原理、“相互联系的生活”原理以及“生命过程中的时机”原理。个体的生命历程会受到变化着的历史时空、与个人相互关联的社会网络以及生活中特定时机的影响,所以生命历程理论特别关注宏观事件和结构特征对个人生活史的影响,要求将社会历史和社会结构联系起来阐述人类的生活(李强等, 1999),同时生命历程也强调个人对社会过程具有能动性反应,个体可以选择自己的行为,从而对社会结构产生影响。

区别于传统研究所使用的大量统计数据资料,生命历程方法更注重收集研究对象的信件、照片、家庭档案等“活材料”(包蕾萍, 2005),以及对研究对象及亲友的访谈,从而达到“让研究对象自己讲述自己故事”的效果。

将生命历程的方法应用到地理学中,可以通过个体的生活经历来再现被研究者的经验和他所理解的世界,用个体生活故事来凸显“叙述”的意义和“叙述性的自我认同”,解释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过程及其所蕴含的社会、文化和地理背景,从而达到验证理论和诠释新知识的目标(Andrews et al, 2000; 杨善华等, 2005; Kvale et al, 2009; 柴宏博等, 2016)。城市事件的发生会对城市中的个体产生直接的影响,而个人的生命历程又是由这些不断发生的生命事件构成的(冯健等, 2016)。所以该方法的应用有助于打破宏观与微观研究的隔阂,深入理解微观生活、个体生活和社会空间的互动,使研究变得更加有深度,更加“有血有肉”。本文通过个人生命历程来研究城镇化,也是对该方法应用的一个探索。但需要强调的是,生命历程方法也有一些局限性,如样本的个体差异会影响研究的有效性和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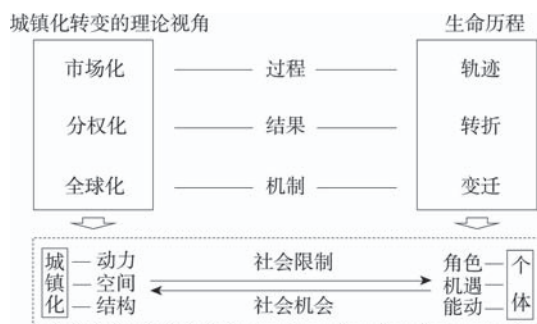


图1 本文分析的理论框架

Fig.1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is study

表性。

### 3.2 研究对象

本文中故事发生的地点主要在现江阴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朝阳村(原江阴山观镇朝阳村,为了结合时代背景,后文的叙述采用山观镇朝阳村)。江阴是苏南模式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地方,从本土乡镇企业起家,如今已连续10年蝉联中国第一经济强县(市),目前拥有36家上市公司,形成了独特的“江阴板块”。朝阳村原属山观镇(图2),2003年并入澄江镇,2007年澄江镇撤镇设街,朝阳村由江阴市经济开发区新城东办事处管辖,2009年改为由城东办事处管辖。

本文选择苏南早期的乡镇企业家杨先生作为案例样本,因为其生命历程受到苏南社会的变迁影响较大,他的生活轨迹与苏南的发展轨迹相关性高。杨先生1952年出生于江阴市,初中辍学后学习木匠手艺,之后开始经营木材生意,并积累了一定的生意经验和人脉。在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兴起时,他回到江阴,投身乡镇企业,最终成为乡镇企业的商业能人。90年代苏南乡镇企业出现困境,杨先生在乡镇企业的生意遇到困难最终被迫躲债,在乡镇企业改制后,杨先生又回到江阴开始作私营老板,晚年因为征地拆迁,而成为失地农民。因为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都受到个体差异、宏观环境和当时事件的综合影响,所以本文在将杨先生的生命历程看作是改革开放后苏南一代人集体记忆写照的同时,也承认由于个体差异,杨先生的生命历程也有其独特之处,例如他的人生起落更加突出,乡镇企业时期他几乎是当时村里最成功的乡镇企业家,在大多数乡镇企业衰落改制的时候,杨先生因为自身原因遇到更大的麻烦而开始躲债,但这样的独特性也是存在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之下的。

深度访谈法是本文采用的最主要的研究方法,



图2 山观镇区位图

Fig.2 Location map of Shanguan Town

虽然本文仅是描述了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但访谈对象却不仅仅局限于杨先生本人,还包括他的亲人、曾经的合作伙伴、同小区的住户以及随机访谈的村民等。同时,笔者也搜集了一些杨先生过去的照片、名片等旧资料,试图从全方位了解杨先生以及他所生活的每一个时代。

## 4 个人生命历程:从乡镇企业到集中安置

### 4.1 从“杨厂长”到外出避债

1985年,一直在外做生意的杨先生回到了山观镇,在镇上最大的乡镇企业申澄服装厂的事业部作供销,负责从江阴或江苏省内其他厂采购原料。1990年,由于朝阳村自办的砖厂长期亏损,拖欠工资,工人开始闹事,村长便找到了杨先生,请他从申澄厂回到村里经营砖厂。杨先生到来后,立即向申澄厂借了数万块钱还了部分工资,剩余的欠款又通过砖瓦来抵债。之后通过重点抓产量、抓成本、抓销售,使得砖厂由亏转盈。1992年,村里又安排杨先生去村里制衣厂作经理,一方面看重杨先生的管理才能,另一方面由于杨先生之前在申澄厂上班,能为服装厂拿到订单。

乡镇企业发展极大地改善了杨先生的家境。杨先生家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非常富足,生活水平远高于不少城市居民。1986年杨先生家已经率先买了彩电、安装了电话。1987年杨先生家盖了新房子,仅装修就花了三、四万元,楼上、楼下两层楼都有浴室和抽水马桶。当时厂里普通工人,一年工资仅上千元,也已大大超过了当时务农的收入,很多村民在20世纪80-90年代都翻新了旧屋或新建了楼房。总之,乡镇企业发展使得村民生活得到了改善,让村民在“离土不离乡”的情况下,生活条件开始向城市靠拢。

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乡镇企业逐渐衰败,经营不好的乡镇企业被关停。因为政府号召保护环境,不再允许烧窑,砖厂被关闭。制衣厂由于竞争激烈,经营状况一直欠佳。1992年,杨先生的亲戚介绍其朋友来承包制衣厂,杨先生和副厂长作为担保人,将制衣厂承包出去,但生意依旧难做。1993年年底,承包人突然卷款潜逃,杨先生作为担保人要负极大责任,甚至有坐牢风险。于是杨先生全家只能分开躲债,杨先生在无锡、苏州和上海之间辗



转躲债,妻子带着子女在亲戚家不断借宿,这一段生活非常艰难。

#### 4.2 从“杨经理”到“杨木匠”

1995年,杨先生避债结束,重新回到江阴。苏南乡镇企业当时已经开始改制,政府逐渐退出企业。改制后苏南私营市场活力被大大激活,出现了“遍地是老板,人人是经理”的现象。镇上来来往往都是夹着黑色大公文包、公文包里放着自己的名片夹子、腰间别着BP机的总经理。由于私营企业的成立几乎无门槛,这些私营公司有些只有总经理一个员工,也称为“XX公司”。杨先生回来后,想趁当时私营经济热潮再次创业做生意。因为早年在制衣厂时结识了无锡棉毛公司的人,能拿到原料,杨先生就和五个朋友合伙在周庄镇的纺织市场租了一个门市部,成立了“江阴市双达纺织有限公司”,自己任总经理。公司第一年赚了5~6万元,之后都因为竞争激烈,公司只能保本。很快他的其他合伙人就撤资了,杨先生开始自己独立经营。1997年金融危机冲击了江阴的纺织行业,生意更加难做,加上自己年龄增大,杨先生决定不再做生意,又回到朝阳村,凭借年轻时候学习的木匠手艺,在家接一些木匠活赚钱。同一时期,由于国企改革引发了下岗潮,在1997年年底,杨先生夫人所在的朝阳村招待所关闭,她从此下岗,开始去市里、镇上打工。杨先生和他夫人两人先后失去工作,家庭收入骤减。正当此时,杨先生大女儿考上了大学,小儿子也在读初中,学费开支不菲,虽然杨先生家早年家境殷实,但此时家里也开始慢慢变得拮据。

#### 4.3 是失地农民还是“杨百万”?

进入21世纪,江阴也开始进行征地拆迁。2005年,朝阳村开始拆迁,2014年整村拆迁完毕。这与江阴高新区(前身是江阴经济开发区)的发展密切相关,2011年江阴经济开发区升级为国家级高新技术区,面积扩大到53 km<sup>2</sup>,囊括了杨先生家所在的山观镇。2012年杨先生家被拆迁,按照当地规定,可以分配到3套安置房。杨先生将这3套房子卖掉,拿到了130万现金,最后花了45万买了一套房子自住。拆迁之后,杨先生的家境得到了极大改善。当地农民通过拆迁,每家基本都分到了2套“对对户”(即一层楼的两套房都分给一家人)。拆迁上楼之后,杨先生开始在附近超市或者小区里做零工。有一次,杨先生在超市打工时,遇见村里朋友,朋友打趣道:你都已经杨百万了,还来超市打工!回家坐着花钱就好。

苏南的征地拆迁是一个相对顺利的过程,村民们基本都很配合。从20世纪80年代发展乡镇企业至今,农民们都已经基本脱离农田,生活水平也获得极大提升,征地拆迁成为他们再次提高生活水平的路径。拆迁补偿解决了不少年轻人的房子和汽车问题,家境改善也让年轻一辈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杨先生家获得的赔偿让家庭有能力支持儿子继续在外读书深造,同时也解决了儿子未来的住房问题。杨先生的女儿和女婿通过女婿家的拆迁补偿,获得了自己的住房,不用再和男方父母挤在原来的老房子里。

但对于像杨先生这样年纪较大的人,拆迁上楼还是在一定程度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图3)。杨先生在“上楼”之后,不方便再做木匠,开始出去打零工。同时,他也无法再种地,失去了一部分经济来源,为此,政府给村民每人每月发放一笔“口粮钱”。杨先生趁老家自留地还没建上房子,不上班的时候,他会回到老家自留地种蔬菜,一部分自给自足,另一部分卖给开发区的工厂食堂。此外,杨先生以及很多拆迁农民都还保留着原来村里的生活习惯。例如,他们基本上还按照村里的时间作息,早上5点左右起床,晚上7点左右睡觉;吃饭的时候,一些住在一楼的村民仍然喜欢端着碗在家门口吃,遇见熟人边吃边聊天。

对于拆迁农民来说,搬到安置社区后,不可能完全复制其在村里的人际关系网络,但由于是同村安置,其原有的血缘、地缘关系会被带到安置社区,即原来的人际关系可以一部分被保留(汪萍,2012)。邻居和亲戚仍然是首要的交往对象。但新环境所导致的社会网络变迁是必然的。由于居住空间从家庭院落到高层住宅,村民之间的相互交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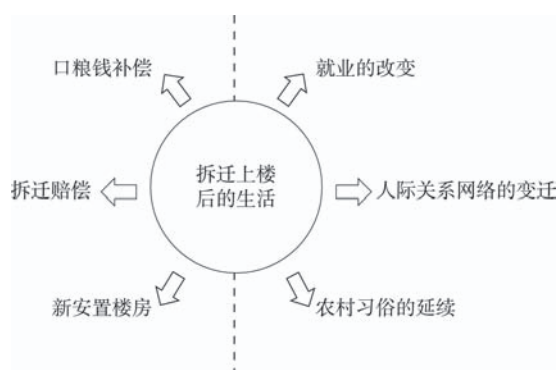


图3 拆迁“上楼”后农民的生活示意图

Fig.3 Change in farmers' lives after resettlement

受到一定的限制,所以一些农民串门交往的频率减少。在这种情况下,村民们相互之间的交往会更加依赖小区中的空地和广场等公共空间。但是对于杨先生来说,他的人际关系网络出现了更大的变化。由于他现在的住房是自己在房产市场上购买的,并非当时拆迁安置时分配的,所以他和本村其他村民以及亲戚住在不同的小区,尽管中间只隔了一条马路,但还是带来了“距离”。在村里生活时,杨先生晚饭后会四处串门打麻将。但现在他吃完晚饭,休息一下就睡觉了,也很少下楼去活动。由于在小区里认识的人并不多,杨先生原来的人际关系网络遭到了冲击,但是新的人际关系网络又尚未建立起来。

## 5 苏南城镇化转变中的个体市民化进程分析

苏南从“乡镇企业”时期到“企业改制”时期,再到“征地拆迁”时期,这样的城市发展历程也影响了农民的生命历程,杨先生经历了从“杨厂长到外出避债”,“从杨经理到杨木匠”,“是失地农民还是杨百万”的生活变迁(图4)。下面着重从基层行政组织和政府行为角度来讨论这种变化对村民个体市民化进程所产生的影响。

### 5.1 乡村工业化与就业非农化

1984年中央4号文件将苏南的“社队企业”更名为“乡镇企业”,并提出要支持鼓励发展乡镇企业,拉开了乡镇企业发展的序幕。1986年,苏锡常共有3.05万个乡镇企业,平均每个镇(乡)拥有工厂

77.12家,苏南成为中国乡村工业企业分布密度最高的地区。乡镇企业“以工兴镇、以工支农”,以发展工业来解决苏南人多地少、农村剩余劳动力多的问题,因而早期的乡镇企业多为劳动密集型或轻型加工业,如纺织、机械制造、水泥生产等。费孝通对这种“以工兴农”的乡村工业形式大为赞赏,认为“这种基层工业化是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发生、发展的,同时又促进农业的发展”,不同于西方国家都市兴起后,农村濒临破产,农民被迫背井离乡的发展模式(费孝通, 1984)。改革开放初期,国内轻工业产品缺乏,乡镇企业的产品正好能对应这个缺口,市场的大需求量促进了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Naughton, 1995)。地方政府是这个时期工业化的重要推动者,同时政府也通过主导乡镇企业,对企业进行干预,政府直接经营企业或成为企业的实际决策者(杨云彦等, 2000)。首先,基层行政组织主导着企业的资源,村里为乡镇企业提供办厂的土地和资金,一些地方政府还积极帮助企业向银行贷款。其次,基层行政组织还会获得大部分的企业利润,乡镇企业的利润都会直接上交村里,会计由村里指派,不少厂长都不清楚企业盈亏如何。同时,基层行政组织还主导着乡镇企业的人事,村里可以指派企业的厂长以及工人(图5)。

在基层行政组织引导下,苏南通过乡镇企业实现了“自下而上”式城镇化(表1)。在这个时期,广大苏南农民在“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情况下完成了农业向非农就业的转换,通过乡镇企业实现了“就业的非农化”。小城镇是这个时期苏南城镇化的重要载体,不少乡村撤乡建镇,小城镇数量、面



图4 杨先生的生命历程

Fig.4 The life course of Mr. Y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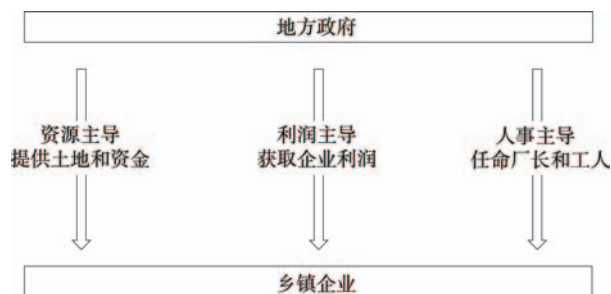


图5 地方政府对乡镇企业的主导行为示意图

Fig.5 Local government's leading role in township enterprises

积、类型增加,功能逐渐提升(冯健等, 1999)。小城镇的发展缩小了苏南城乡差距,推动了苏南的城镇化。村民积极投身乡镇工业,变成企业工人。人们的生活围绕着乡镇企业展开,而不再是围绕着农田。一部分人直接进厂就业,另一部分人围绕乡镇企业延伸出来的产业工作。例如,砖瓦厂拉砖送瓦的运输都是靠村民自己家的拖拉机,并且当时苏南还有非常多的家庭小作坊,承包厂里的纺织、零件加工等订单。农民的生活已经走向非农化,农田耕作在这时仅仅只是为了生产口粮。杨先生只是当时众多村民中的一个,乡镇企业刚被中央认可和支持后,他便立即回乡,进入乡镇企业工作,凭借自身能力和经验,从销售做到厂长。到1988年,江阴从事第二产业的人占到了全部从业人数的60.02%,从事第一产业的人仅占20.84%。并且,非农就业带来了农民收入的显著提高,其中,以工业收入为主。1984年,江阴市村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09元,到了1992年,农民的收入已经增加到了2077元,其中超过60%的部分来源于工业收入。但这个时期,农民仅实现了就业的非农化,仍拿着农业户口,居住在农村,流动受到限制,也无法享受城市的福利。

## 5.2 土地财政与身份城镇化

虽然乡镇企业推动了苏南的农村工业化,却让苏南陷入了“过度工业化”的处境(张军, 2002)。1995年苏南开始进行乡镇企业改制,改制的目的是为了割断政府与企业的资产关系,让企业更好地在市场经济中运作(叶勤良, 2005)。地方政府通过放权、正位的方式从竞争性和垄断性领域退出来,把直接管理经济的权力交还给企业(洪银兴, 2005)。通过改制,苏南进入“二次创业”时期,强调更注重提升乡镇企业的质量和效益。

关于乡镇企业改制的原因,有很多方面的解释。从乡镇企业内部来看,早期政企合一的模式破

表1 乡镇企业对苏南城镇化的促进作用

Tab.1 The role of town and township enterprises in the urbanization of the Southern Jiangsu area

作用表现	具体例证
促进就业	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约2/3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工厂务工
非农化	
增加农民收入	1992年苏南农民的收入是1984年的3倍,从609元增加到2077元
促进小城镇发展	从1987年到1992年,江阴建制镇数量迅速增加,1987年为10镇20乡,1992年为28镇,且不再乡
提高村公共服务设施	政府利用乡镇企业的盈利完善村庄公共服务设施
共服务设施水平	1991年,江阴各村都建立老年活动室,大部分村庄都通了自来水,各镇的医院、小学、汽车站都相继完善

坏了企业自身的运行机制,政府在乡镇企业中的“双重”角色导致乡镇企业产权模糊,增加了企业的政治负担(邱成利等, 2000; 新望, 2005)。并且乡镇企业遍地开花,生产质量参差不齐,以及大量的呆账、坏账都让乡镇企业的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逐渐遇到瓶颈。从分权的视角来看,1994年通过分税制改革,工商企业税在分税制之后大部分归属中央政府,使得政府无法再依赖乡镇企业获取大量的企业税收,让政府兴办乡镇企业的动力受挫,开始逐步退出企业(Oi, 1992)。从外部原因来看,国内市场的逐渐完善,来自珠三角、国企改革等的竞争让乡镇企业受到了冲击,必须转型(朱建昌, 1996)。

改制后政府虽然退出了企业,但“强政府”的现象依然存在。政府从经营企业中撤出,逐步转向开发区建设和土地财政(图6)。早期政府希望通过建工业园区、地方市场、招商城来招商引资和产业“提质”,促进股份合作制、股份制、民营等多种经济形式的发展,再次激活苏南市场。乡镇企业改制后,不再有村集体企业,企业为了经济效益进行裁员,“让过去离土不离乡的农民离土又离乡了”(费孝通, 1999),部分村民从村集体企业中脱离出来,重新自由在市场寻找商机。村庄经济能人也能在更广泛的市场中找到与自身匹配的工作。杨先生避债回来后,不必再回到本村的企业找工作,干脆凭借自己的人脉,离开了村庄,在经济更好的周庄镇开了私人公司,成为私营公司经理。

进入21世纪后,苏南的工业园区和市场建设等迅速与征地拆迁联系在一起。从1987年逐渐开始进行的土地改革,使得地方政府有权征收、开发和出让农业用地;1994年和1998年中国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增加了城市土地需求。农用地征收和出让之间的利润剪刀差,让政府经营土地的欲望变得更加强烈。此外,全球化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外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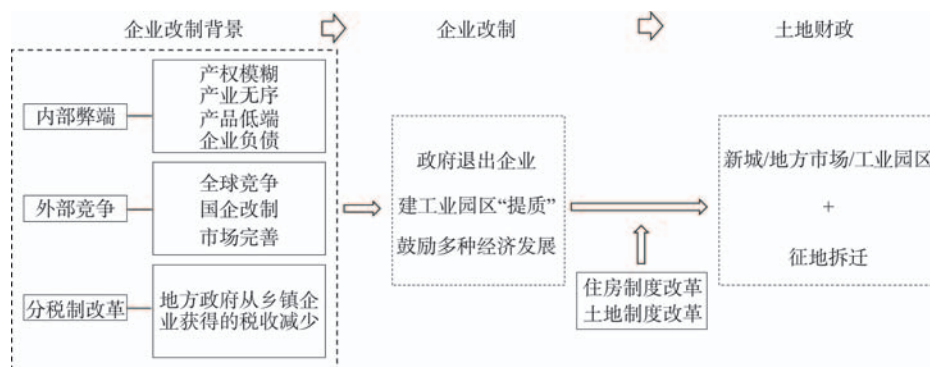


图6 地方政府转向土地财政的背景示意图

Fig. 6 The background under which local governments turn to land finance

的流入使得江阴周边的城市,如上海、苏州、昆山等都迅速发展,也促使江阴市政府通过土地财政来改善城市环境,以此应对挑战。1999年江阴出台《江阴市城市规划区农民房屋拆迁暂行规定》文件,要求对农民“独门独院”的传统居住格局进行改变,将农民集中安置进统一规划的公寓房,节约居住用地。2001年江阴市以打造沿江经济开发区为契机,开始推行“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农业向生态园区集中”的“三集中”政策。2006年以来,江阴市还出台了“三强”举措——“强势分割,强力征收、强制收回”,对土地的使用进行强制性集约。

2006年江阴市户籍制度改革,杨先生从农业户口变为居民户口,但户籍的改变并没有给其生活带来太多实质性变化。直到2012年,他家进行拆迁,随着村庄消失,杨先生在这一阶段迅速实现了身份的城镇化,即户籍和居住地的城镇化。现在,杨先生是一个既有城镇居民户口、又住在社区小高层的江阴市民。村民用自己的土地换取了赔偿和福利(周飞舟等, 2015),同时告别村庄,成为社区人。从2002年到2004年,江阴市区累计拆迁220万 $\text{m}^2$ ,腾出建设用地4万亩,每年投入城市建设的资金超过了20亿元。从江阴市区到镇上,沿路出现的是“安置小区—工业区—安置小区—工业区”相互交替的城市景观,正是现阶段极具苏南特色的城市景观,背后所反映的是苏南现阶段城镇化的机制——以征地拆迁和开发园区建设共同推进的快速城镇化。在上一阶段,农民参与城镇化的方式是进厂务工,从农业转为非农业,完成就业的非农化;而在这一阶段,在资本推动下,通过征地拆迁和户籍改革,在户籍和居住地上已经城镇化,与城市居民无异,即完成了身份的城镇化(图7、表2)。

## 6 结论与讨论

区别于传统上宏观角度的城镇化研究文献,本文利用生命历程方法,从微观视角探讨苏南城镇化路径转变,同时也讨论了苏南农民的市民化进程。

(1) 从研究方法上看,生命历程方法是研究社会变迁的一种独特视角,用生命历程方法讨论社会变迁可以打破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隔阂。

本文利用个体生命历程方法讨论苏南城镇化路径转变及农民市民化进程,有助于还原个体的生活世界,以及从多角度更全面地理解城镇化模式的发展及其变迁。个体生命历程的方法强调个人生活在一定的历史时空中,强调宏观社会变迁对于个体的影响。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宏观背景对研究对象的影响相对较小,但在当代中国经济变革剧烈的背景下,将研究对象与社会变迁结合起来考虑是非常有必要的(李强等, 1999)。正如米尔斯所说,“有哪一个时代,会有这么多的人以这么快的速度去面临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 ……现在,每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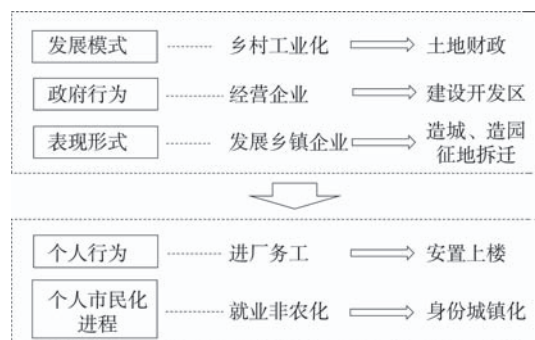


图7 苏南发展模式影响下的个人市民化进程示意图

Fig.7 Process of the transition of farmers to urban resident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Southern Jiangsu development model

表2 苏南不同时期的地方政府行为、城镇化模式和个体生命历程的互动

Tab.2 Interactions between local government's behavior, urbanization pattern, and individual life course in Southern Jiangsu in different periods

		乡镇企业(1980-1990年)	村企改制(1991-2000年)	土地财政(2001年至今)
地方政府行为	行为背景	1984年中央4号文件:将社队企业正式改名为乡镇企业,鼓励发展乡镇企业	1994年分税制实施,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主要税种划分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外部市场的日益完善和自身弊端的暴露,使得乡镇企业的发展遇到了瓶颈	1999、2001、2002、2003年,中国不断出台关于实行土地“招拍挂”的政策
	行为	推动乡镇企业,主导企业发展	退出企业,推动企业改制;转向企业管理和土地出租	推进旧城、旧村改造;兴建工业园区和新城
	具体政策	1981年提出“立足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为农业”的口号;1988年提出“抓工业重点企业”的战略决策,并给予政策倾斜扶持;随后出台《关于扶持“五大一小”企业,促进转化的意见》,对陷入困境的企业进行帮助	1995年《关于深化企业改革的意见》:对改革的相关内容进行明确规定,形成以“大型企业集体控股上水平,中型企业多方参股增活力,小型企业拍卖转让搞民营”的改制思路;1997年,镇村企业“清假放小”工作结束,1998年中型企业改制完成,1999年对大型企业进行改制	1999年《江阴市城市规划区农民房屋拆迁暂行规定》:改变传统农居形式,将农民集中安置进公寓房;2001年江阴市实行“三集中”政策;2006年出台“三强”政策;2006年《江阴市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实施办法》:统一将户口登记为“居民户口”
城镇化	动力	乡村工业		土地财政
对个体的影响	空间特征	分散,以小城镇为载体		集中,工业园和安置社区为主
	农民生活	进厂务工,从“农业”转为“非农”,生活水平提高	就业多元,个体经营,企业务工等	户口改变 拆迁“上楼”,居住形式社区化 生活方式进一步提升
	生命历程	乡镇企业的厂长	外出避债;私营经济的老板	失地农民
	市民化进程	就业非农化		身份城镇化

的历史都是世界的历史”。每一个人都是时代的缩影,社会的发展在个体的人生留下烙印,所以对个人生命历程的探究具有反映时代的意义,同时,也只有将个人的生活与社会的历史连接在一起,才能更好地理解人们的生活。用生命历程来讨论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使得个体生活事件能够与宏大的社会历史变迁背景联系在一起,展现了个人生活史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与映射关系(冯健等, 2011)。

(2) 个人生命历程背后所反映的是社会的结构性变迁,要理解苏南典型个案的生命历程,必须联系苏南由乡村工业转向开发区建设和土地财政的城镇化路径变迁,以及更大范围的国家和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包括中国政府的分权、经济、土地制度改革以及全球化。

从本文的个体案例杨先生的生命历程来看,20世纪80年代他投身乡镇企业,家境改善;此后又因企业衰落而外出避债,回来之后创办私营公司,但最终失败。晚年因为征地拆迁获得很多赔偿与住房,生活条件再次好转,但同时他也变成了失地农民。杨先生的生命历程背后是中国各项制度的改革和苏南城镇化的路径转变,从中可以透视出苏南城镇化动力与空间关系的转变,以及农民、政府、企

业与土地等要素的关系转变。

苏南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已经由乡村工业推动、小城镇为载体的自下而上式城镇化转变为由开发区建设和土地财政推动的快速城镇化。20世纪80年代,苏南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工业发展带来了人口的集聚,小城镇数量、类型都显著增加。同时乡镇企业带来的利润为苏南的城镇建设提供了资金。到90年代中后期,苏南各地政府通过开发区建设,一方面促进了产业集聚,吸引外资投入,提升了苏南的产业竞争力;另一方面,开发区建设推动了土地财政的发展,原来零散的工业被集中到开发园区,大量农民因为开发区征地拆迁而进入安置社区。

乡镇企业自身的发展弊端,中国的土地、财政等制度改革以及全球化的竞争造成了地方政府从经营企业到推动开发区建设和土地财政的行为转变,从而推动了苏南城镇化路径的转变。首先,早期苏南地方政府大力推动乡镇企业的发展,主动参与企业经营,地方政府与企业形成政企合一的关系。通过这样的形式推动了乡镇企业的发展,但也使得乡镇企业承担了过多的政治负担,后期发展动力不足。所以90年代之后,苏南通过乡镇企业改制,使地方政府退出企业。其次,苏南城镇化路径

转变的背后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结构性变迁。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一系列的制度变革,推动了城镇化的转变。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行政与财政分权强化了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经济税种变为共享税,改变了地方曾经依靠企业税获取财政收入的方式;土地制度的改革形成了双重“二元市场”,二元市场中土地出让产生的巨大利润差促进了土地的市场化和资本化。再加上全球化带来的巨大竞争,使得苏南地方政府开始探索新的城镇化发展道路,即以开发区建设来进行产业提质和吸引外资,最终推动苏南的城镇化转为开发区建设和土地财政。地方政府从经营企业、退出企业到推动园区经济以及城市扩容的过程,推进了苏南城镇化路径转变。通过对城镇化路径转变的宏观探究,可以更好地理解文中的案例杨先生经历了从乡镇企业家、私营企业主到失地农民的生命历程变迁。

(3) 从微观的角度来看,苏南农民的生命历程也是他们不断市民化的过程。苏南农民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经历了“就业的非农化”和“身份的城镇化”两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苏南农民市民化的“被动”色彩增强,传统的“自下而上”式城镇化内涵面临消解。

城镇化路径转变带来了农民市民化进程和行动地位的转变。在乡镇企业时期,苏南农民与地方政府共同推动了苏南“自下而上”式城镇化,农民积极进入乡镇企业务工,不再依赖农业生产,在“离土不离乡”的情况下,主动完成就业的非农转变。在土地财政的阶段,苏南农民通过地方政府的户籍制度改革获得了居民户口,通过征地拆迁被安置到城镇社区,完成了身份的城镇化,但这个阶段的市民化,更多源于政府的主动推动,农民带有“被动接受”的成分。换言之,从乡镇企业到征地拆迁,地方政府一直是苏南城镇化的行动主体,但随着土地财政的进行,大资本的侵入,农民在城镇化中逐渐变成被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传统的苏南模式中的“自下而上”城镇化已经发生了转变,农民已经从“自下而上”式城镇化的行动主体中被剥离出去。

另外,通过苏南农民市民化的进程,可以看出市民化中的“化”的确是一个过程,需要就业、身份、生活方式等方面相互协调发展。在苏南的案例中,早期就业的非农化是后期村民顺利实现身份城镇化的基础。长期的非农就业,让苏南大多数农民,特别是年轻一代对土地和农业的依赖度低,也不再依靠农业营生,前一个阶段的就业非农化解决了农

民在“上楼”后因为失去土地而失去生活来源的问题。这一点对于当前新型城镇化所倡导的“人的城镇化”具有一定启示。例如,在中国一些中西部地区大多数以农业为主的农村,农民现代化程度低,单纯通过大规模的集中安置、拆迁上楼,推进农民的市民化进程显然是不适宜的。

##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包蕾萍. 2005. 生命历程理论的时间观探析[J]. 社会学研究, (4): 120-133. [Bao L P. 2005. Reflects on the timing view of life-course theory[J]. Sociological Studies, (4): 120-133.]
- 柴宏博, 冯健. 2016. 基于家庭生命历程的北京郊区居民行为空间研究[J]. 地理科学进展, 35(12): 1506-1516. [Chai H B, Feng J. 2016. Behavior space of suburban residents in Beijing based on family life course[J]. Progress in Geography, 35(12): 1506-1516.]
- 陈鹏. 2007. 基于土地制度视角的我国城市蔓延的形成与控制研究[J]. 规划师, 23(3): 76-78. [Chen P. 2007. Research on the formation and control of China's urban sprawl from the viewpoint of land institution[J]. Planners, 23(3): 76-78.]
- 费孝通. 1984. 小城镇 再探索(之一)[J]. 瞭望周刊, (20): 14-15. [Fei X T. 1984. Xiaochengzhen, zaitansuo (zhiyi) [J]. Outlook Weekly, (20): 14-15.]
- 费孝通. 1999. 苏南乡村发展的新趋势[J]. 中国乡镇企业, (11): 4-6. [Fei X T. 1999. Sunan xiangcun fazhan de xinqushi[J]. China Township Enterprises, (11): 4-6.]
- 冯健. 2012. 乡村重构: 模式与创新[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Feng J. 2012. Xiangcun chonggou: Moshi yu chuangxin [M]. Beijing, China: The Commercial Press.]
- 冯健, 柴宏博. 2016. 定性地理信息系统在城市社会空间研究中的应用[J]. 地理科学进展, 35(12): 1447-1458. [Feng J, Chai H B. 2016. The application of qualitative GIS method in urban socio-spatial structure research[J]. Progress in Geography, 35(12): 1447-1458.]
- 冯健, 吴芳芳. 2011. 质性方法在城市社会空间研究中的应用[J]. 地理研究, 30(11): 1956-1969. [Feng J, Wu F F. 2011. The application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in urban socio-spatial structure research[J]. Geographical Research, 30(11): 1956-1969.]
- 冯健, 张小林. 1999. 苏南小城镇发展与现代乡村社区变迁研究[J]. 地理科学进展, 18(3): 222-229. [Feng J, Zhang X L. 1999. A research on development of township and changes of modern rural community of southern Jiangsu province[J]. Progress in Geography, 18(3): 222-229.]
- 弗里德曼. 2004. 规划全球城市: 内生式发展模式[J]. 李泳, 译. 城市规划学刊, (4): 3-7. [Friedmann J. 2004. Planning for the global cities: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model [J]. Li Y, Trans. Urban Planning Forum, (4): 3-7.]
- 顾朝林, 陈璐, 丁睿, 等. 2005. 全球化与重建国家城市体系设想[J]. 地理科学, 25(6): 641-654. [Gu C L, Chen L,



- Ding R, et al. 2005. Globalization and restructuring China's national urban systems[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5(6): 641-654.]
- 顾朝林, 于涛方, 李王鸣. 2008. 中国城市化: 格局, 过程, 机理[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Gu C L, Yu T F, Li W M. 2008. *Zhongguo chengshihua*: Geju, guocheng, jili[M]. Beijing, China: Science Press.]
- 洪世健, 张京祥. 2009. 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背景下中国城市空间扩展: 一个理论分析框架[J]. *城市规划学刊*, (3): 89-94. [Hong S J, Zhang J X. 2009. China's urban spatial growth based on the reform of land use system: A theoretical analytic framework[J]. *Urban Planning Forum*, (3): 89-94.]
- 洪银兴. 2005. 苏南模式的新发展和地方政府的转型[J]. *经济研究参考*, (72): 23-27. [Hong Y X. 2005. Sunan moshi de xinfazhan he difang zhengfu de zhuanxing[J]. *Review of Economic Research*, (72): 23-27.]
- 黄崑. 2011. 城乡二元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影响的实证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1(3): 76-81. [Huang K. 2011.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n the citizenization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from urban-rural dual institution[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1(3): 76-81.]
- 姜作培. 2003. 农民市民化必须突破五大障碍[J]. *城市规划*, 27(12): 68-71. [Jiang Z P. 2003. Five obstacles on the way of urbanization of rural population[J]. *City Planning Review*, 27(12): 68-71.]
- 李强, 邓建伟, 晓箏. 1999. 社会变迁与个人发展: 生命历程研究的范式与方法[J]. *社会学研究*, (6): 1-18. [Li Q, Deng J W, Xiao Z. 1999. Shehui bianqian yu geren fazhan: Shengming licheng yanjiu de fanshi yu fangfa [J]. *Sociological Studies*, (6): 1-18.]
- 李志刚, 闵飞. 2011. 中国模式下的“全球化城市”营造: 广州经验[J]. *规划师*, 27(2): 47-52. [Li Z G, Min F. 2011. China model and the making of globalizing cities: Guangzhou experience[J]. *Planners*, 27(2): 47-52.]
- 刘晔, 刘于琪, 李志刚. 2012. “后城中村”时代村民的市民化研究: 以广州猎德为例[J]. *城市规划*, 36(7): 81-86. [Liu Y, Liu Y Q, Li Z G. 2012. Citizenization of native villagers after redeveloped urban village: A case study of Liede Community, Guangzhou[J]. *City Planning Review*, 36(7): 81-86.]
- 卢现祥. 2000. 寻租经济学导论[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Lu X X. 2000. *Xunzu jingjixue daolun*[M]. Beijing, China: Financial and Economic Press.]
- 邱成利, 冯杰. 2000. “苏南模式”的发展及其路径依赖[J]. *中国工业经济*, (7): 51-55. [Qiu C L, Feng J. 2000. Sunan moshi de fazhan jiqi lujing yilai[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7): 51-55.]
- 汪萍. 2012. 空间重组与社区重建: 一项苏州工业园区失地农民聚居区的研究[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Wang P. 2012. *Restructuring of space and re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A case study on centralism housing landless-farmers' community in Suzhou Industrial Park*[M]. Beijing, China: Science Press.]
- 王春光. 2006. 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J]. *社会学研究*, (5): 107-122. [Wang C G. 2006. A study of floating rural people's "semi-urbanization"[J]. *Sociological Studies*, (5): 107-122.]
- 王文超, 袁中金. 2010. 行政性分权下的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研究[J]. *城市发展研究*, 17(11): 13-18. [Wang W C, Yuan Z J. 2010. Research on the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evolution in administrative decentralization background[J]. *Urban Studies*, 17(11): 13-18.]
- 吴业苗. 2016. 人的城镇化的基本内涵与实现条件[J]. *城市问题*, (9): 4-10. [Wu Y M. 2016. Connotation of people-centered urbanization and conditions for its realization[J]. *Urban Problems*, (9): 4-10.]
- 新望. 2005. 苏南模式的终结[M]. 北京: 三联书店. [Xin W. 2005. *The ending of Sunan model*[M]. Beijing, China: Joint Publishing.]
- 杨善华, 孙飞宇. 2005. 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度访谈[J]. *社会学研究*, (5): 53-68. [Yang S H, Sun F Y. 2005. Depth-interview as meaning exploring[J]. *Sociological Studies*, (5): 53-68.]
- 杨云彦, 陈浩, 陈金永. 2000. 乡村工业嬗变与“自下而上”城镇化[J]. *广东社会科学*, (1): 107-113. [Yang Y Y, Chen H, Chen J Y. 2000. Xiangcun gongye shanbian yu "zixiaer-shang" chengzhenhua[J]. *Social Sciences in Guangdong*, (1): 107-113.]
- 叶勤良. 2005. 制度变迁中的政府行为分析: 以苏南模式为研究对象[D]. 上海: 复旦大学. [Ye Q L. 2005. *Zhidu bianqian zhong de zhengfu xingwei fenxi: Yi Sunan moshi wei yanjiu duixiang*[D]. Shanghai, China: Fudan University.]
- 张京祥, 吴缚龙, 马润潮. 2008. 体制转型与中国城市空间重构: 建立一种空间演化的制度分析框架[J]. *城市规划*, 32(6): 55-60. [Zhang J X, Wu F L, Ma L R C. 2008.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China's urban space: Establishing a institutional analysis structure for spatial evolution[J]. *City Planning Review*, 32(6): 55-60.]
- 张京祥, 殷洁, 罗小龙. 2006. 地方政府企业化主导下的城市空间发展与演化研究[J]. *人文地理*, 21(4): 1-6. [Zhang J X, Yin J, Luo X L. 2006. Research of urban spati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local government's entrepreneurialization[J]. *Human Geography*, 21(4): 1-6.]
- 张京祥, 赵丹, 陈浩. 2013. 增长主义的终结与中国城市规划的转型[J]. *城市规划*, 37(1): 45-50, 55. [Zhang J X, Zhao D, Chen H. 2013. Termination of growth supremacism and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urban planning[J]. *City Planning Review*, 37(1): 45-50, 55.]
- 张军. 2002. 资本形成, 工业化与经济增长: 中国的转轨特征[J]. *经济研究*, (6): 3-13. [Zhang J. 2002. Capital formation, industri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Understanding China's economic reform[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6): 3-13.]

- 张三保, 田文杰. 2014. 地方政府企业化: 模式、动因、效应与改革[J]. 政治学研究, (6): 97-109. [Zhang S B, Tian W J. 2014. Local governments' entrepreneurialization: Models, causes, effects and reform strategies[J]. CASS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6): 97-109.]
- 张庭伟. 2003. 对全球化的误解以及经营城市的误区[J]. 城市规划, 27(8): 6-14. [Zhang T W. 2003. The misunderstood globalisation and the misled selling place in China [J]. City Planning Review, 27(8): 6-14.]
- 周飞舟. 2006. 分税制十年: 制度及其影响[J]. 中国社会科学, (6): 100-115. [Zhou F Z. 2006. A decade of tax-sharing: The system and its evolution[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6): 100-115.]
- 周飞舟. 2007. 生财有道: 土地开发和转让中的政府和农民[J]. 社会学研究, (1): 49-82. [Zhou F Z. 2007. The role of government and farmers in land development and transfer [J]. Sociological Studies, (1): 49-82.]
- 周飞舟, 王绍琛. 2015. 农民上楼与资本下乡: 城镇化的社会学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 (1): 66-83. [Zhou F Z, Wang S C. 2015. Farmers moving upstairs and capital going down to the countryside: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urbanization[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 66-83.]
- 周黎安. 2004. 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 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J]. 经济研究, (6): 33-40. [Zhou L A. 2004. The incentive and co-operation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in the political tournaments: An interpretation of prolonged local protectionism and duplicative investments in China[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6): 33-40.]
- 朱建昌. 1996. 关于苏南乡镇工业第二次创业的思考[J]. 江南论坛, (2): 15-16, 9. [Zhu J C. 1996. Guanyu Sunan xiangzhen gongye di er ci chuangye de sikao[J]. Jiangnan Forum, (2): 15-16, 9.]
- Afridi F, Li S X, Ren Y F. 2015. Social identity and inequality: The impact of China's hukou system[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23: 17-29.
- Andrews M, Sclate S D, Squire C, et al. 2000. Lines of narrative: Psychosocial perspectives[M]. London, UK: Routledge.
- Chan K W. 1992. Economic growth strategy and urbanization policies in China, 1949-1982[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6(2): 275-305.
- Chan K W. 2009. The Chinese Hukou system at 50[J].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50(2): 197-221.
- Ding C R. 2003. Land policy reform in China: Assessment and prospects[J]. Land Use Policy, 20(2): 109-120.
- Elder Jr G H. 1974. Children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Social change in life experience[M].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an S S, Wang Y. 2003. 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a property market in inland China: Chongqing[J]. Urban Studies, 40 (1): 91-112.
- Harvey D. 1989. From managerialism to entrepreneurialism: The transformation in urban governance in late capitalism [J]. Geografiska Annaler, 71(1): 3-17.
- Jessop B, Sum N L. 2000. An entrepreneurial city in action: Hong Kong's emerging strategies in and for (inter) urban competition[J]. Urban Studies, 37(12): 2287-2313.
- Kvale S, Brinkmann S. 2009. Interviews: Learning the craft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nterview[M]. Los Angeles, USA: SAGE Publications.
- Lin G C S. 1997. Transformation of a rural economy in the Zhujiang Delta[J]. The China Quarterly, 149: 56-80.
- Lin G C S. 2007. Reproducing spaces of Chinese urbanisation: New city-based and land-centred urban transformation[J]. Urban Studies, 44(9): 1827-1855.
- Lin G C S. 2009. Developing China: Land, politics, and social conditions[M]. London, UK: Routledge.
- Lin G C S, Wei H Y D. 2002. China's restless urban landscapes 1: New challenges for theoretical reconstruction[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4(9): 1535-1544.
- Lin G C S, Yi F X. 2011.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or capitalization on urban land? Land development and local public finance in urbanizing China[J]. Urban Geography, 32(1): 50-79.
- Ma L J C. 2002. Urban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1949-2000: A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4(9): 1545-1569.
- Ma L J C. 2005. Urban administrative restructuring, changing scale relations, and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J]. Political Geography, 24(4): 477-497.
- Ma L J C, Cui G H. 2002. Economic transition at the local level: Diverse forms of town development in China[J]. Post-Soviet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43(2): 79-103.
- Ma L J C, Fan M M. 1994. Urbanisation from below: The growth of towns in Jiangsu, China[J]. Urban Studies, 31 (10): 1625-1645.
- McGee T G, Lin G C S, Marton A M, et al. 2007. China's urban space: Development under market socialism[M]. London, UK: Routledge.
- Molotch H. 1993.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machines [J].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15(1): 29-53.
- Naughton B. 1995.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1978-1993[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i J C. 1992. 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J]. World Politics, 45(1): 99-126.
- Sassen S. 1991.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hen J F. 2002. 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post-reform China: The case of Zhujiang delta[J]. Progress in Planning, 57(2): 91-140.
- Sheppard E, Gidwani V, Goldman M, et al. 2015. Introduction: Urban revolutions in the age of global urbanism[J]. Urban Studies, 52(11): 1947-1961.
- Solinger D J. 1999. 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 Peasant migrants, the state, and the logic of the market[M].

-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Tse C W. 2016. Urban residents' prejudice and integration of rural migrants into urban China[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5(100): 579-595.
- Wu F L. 2000. The global and local dimensions of place-making: Remaking Shanghai as a world city[J]. *Urban Studies*, 37(8): 1359-1377.
- Wu F L. 2003a. Globalization, place promotion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 Shanghai[J].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25(1): 55-78.
- Wu F L. 2003b. The (post-) socialist entrepreneurial city as a state project: Shanghai's reglobalisation in question[J]. *Urban Studies*, 40(9): 1673-1698.
- Wu W P. 1999. Reforming China's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for urban infrastructure provision[J]. *Urban Studies*, 36(13): 2263-2282.
- Xu J, Yeh A G O. 2005. City repositioning and competitiveness building in regional development: New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Guangzhou, Chin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9(2): 283-308.
- Yusuf S, Wu W P. 2002. Pathways to a world city: Shanghai rising in an era of globalisation[J]. *Urban Studies*, 39(7): 1213-1240.
- Zhu J M. 2002. Urban development under ambiguous property rights: A case of China's transition econom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6(1): 41-57.

## Urban transformation and the progress of citizenization in Southern Jiangsu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life course

FENG Jian, YE Zhu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Most studies on China's urban transformation employ macro level socioeconomic and political analysis perspectives such as marketization, global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Based on the life course of a farmer-entrepreneur in Southern Jiangsu, this study discusses China's urban transformation at a micro level and the citizenization of farmers in the transformation. Analyzing urban transformation with a life course approach not only links individuals' life events to changes in grand social history, but also manifests the interaction and maps relations between the history of individuals' lives and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Southern Jiangsu area has experienced urban transformation since the 1980s. In the 1980s, urbanization of Southern Jiangsu was grounded in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town development, which was called the "urbanization from below." On the one hand, township enterprises had absorbed a large number of rural surplus labors and as a result, a great number of towns appeared. On the other hand, township enterprises provided funding for urban construction. But since the 1990s, Southern Jiangsu has undergone a rapid urbanization stimulated by development zones that attracted foreign investment and land finance. The governments' development strategy turned to development zone construction and land finance. Heavy intervention imposed on township enterprises by local governments hampered the development of those enterprises. Meanwhile, as a consequence of decentralization, institutional changes in the land market, and globalization, the local government of Southern Jiangsu can no longer rely on township enterprises and has to capitalize on the land to pursue the maximization of profit. From the micro level perspective, the transformation influences roles, events, and opportunities in individuals' life course. The farmer-entrepreneur in this study was a factory manager in a township enterprise at first, then he ran a private corporation, and finally, becaus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development zone, he became a landless farmer. Through changes of his life course, we can understand his citizenization. In the township enterprise period, he obtained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on his own initiative by working in a factory. Later, because of the hukou (population registration) reform and land acquisition and resettlement, he achieved the urbanization of identity, which was mainly promot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became the basis of urbanization of his identity, in the sense that it guaranteed his income after resettlement. This finding provides an enlightenment to "people-centered urbanization" advocated in the new urbanization.

**Key words:** urbanization; citizenization of farmers; life course; life story; Southern Jiangsu